

# 汉明帝与佛教初传

## ——对于中国佛教史一段历史公案的剖析

□ 吴 焯

学术界比较审慎的意见,认为东汉明帝时为佛教在中国的滥觞。其证据就是永平八年明帝给楚王刘英所下的那道著名的诏书:

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何嫌何疑,当有悔吝?其还赎,以助伊蒲塞、桑门之盛饷。

此外,还有一个不能称其为证据的“证据”,那就是关于汉明帝感梦遣使天竺求法的传说。这个传说见于隋代以前的著述有《牟子理惑论》、《四十二章经》、西晋王浮《老子化胡经》、石赵王度《奏疏》、东晋袁宏《后汉纪》、刘宋宗炳《明佛论》、范晔《后汉书》、南齐王琰《冥祥记》、萧梁僧祐《出三藏记集》、慧皎《高僧传》、陶弘景《真诰》、北魏酈道元《水经注》、杨衒之《洛阳伽蓝记》、魏收《魏书·释老志》,以及僧徒伪造的《汉法本内传》等十余部<sup>①</sup>。这么多文献都记载了同一件事,哪一种是原始的记录呢?多数学者认为是《四十二章经》。但也有人以为《四十二章经》系晚出,而以袁宏《后汉纪》为最早<sup>②</sup>。我个人比较倾向第一种说法。下面即引述《四十二章经》这段记载:

昔汉孝明皇帝,夜梦见神人,身体有金色,项有日光,飞在殿前。意中欣然,甚悦之。明日问群臣,此为何神也?有通人傅毅曰:“臣闻天竺有得道者,号曰佛,轻举能飞,殆将其神也。”于是上悟,即遣使者张骞、羽林中郎将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二人,至大月支国,写取佛经四十二章,在十四石函中,登起立塔寺。于是道法流布,处处修立佛寺,远人伏化,愿为臣妾者不可胜数。

上引文尽管被认为是最原始的记录,但疑问颇多。其一,文中出现了张骞的名字,众所周知,张骞奉命出使大月支是西汉武帝初年,早于明帝二百年,而且出使的目的亦非“求法”。其二,所谓通人傅毅,《后汉书》有传,明帝“永平中”他还在平陵“习章句”,可见其年少。明帝子刘炟即位后开始入朝为官,故明帝时不可能作为“群臣”的一员,在殿堂之上为其提供咨询。其三,据永平八年的退赎诏,明帝对佛教已有了解,感梦而知佛,本身就不能成立。所以学者们对于它的真实性多有怀疑,认为此系后人根据明帝给楚王英所下诏书的附会之辞,“后人因明帝做过这样一件事,于是就编造出他派人求法取经等一系列故事”<sup>③</sup>;“楚王英案是事实,而金人感梦是神话”<sup>④</sup>。

● 吴 焯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但不管怎么说,汉明帝时代佛教已经传入中国是可以肯定的。退赎诏中不仅言及浮屠祭祀、洁斋三月的宗教仪式,而且出现了优蒲塞、桑门等一类的佛教专用译名,可见传播已初具规模。我们注意到鱼豢《魏略·西戎传》里的一段话:

昔汉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曰复立(《世说新语》注引作“复豆”)者,其人也。《浮屠》所载临蒲塞、桑门、伯闻、疏问、白疏问、比丘、晨门,皆弟子号。

汉哀帝元寿元年为公元前2年,时间上较明帝为早,而这段记载与上引明帝感梦遣使求法的传说,迥不相同,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它们有着同一个来源。《广川画跋》曾引此文,谓出《晋中经》。《广弘明集》载阮孝绪《七录序》,谓《晋中经簿》有佛书经籍十六卷,则晋室秘府原藏佛经。又《晋中经簿》源出《魏中经》,是魏世朝廷当已颇注意收集佛经。疑其作簿录时,伊存之经或尚在,并已著录,则伊存授经诚“为确然有据之事”<sup>⑤</sup>。当然这并不是定论。《魏书·释老志》引述此事,说“中土闻之,未之信了也”,似佛教并未因此而在中国传播。从中西交通的开辟,与大月氏交往固有可能,可是公元前2年,大月氏亦即贵霜是否已流行佛教,尚有疑义<sup>⑥</sup>。或伊存本来自天竺,而著史者根据当时中国与大月氏的往来,错托为月氏使节,亦未可知。中国人本有“有闻必录”的习惯,尽管一种宗教的传播是须有人信,方才成立<sup>⑦</sup>,但在没有人信仰的情况下,做为一种外国的事物、异闻,把它记录下来,行诸文字,乃自然之趋势。记录人如景卢,可能并未意识到它是一种宗教的传播,或者自己在有意传播宗教。汉朝的博士掌古今史事待问及书籍典属,采集各方异闻和记事,是他们应尽的职责,也是首先想到的义务,未必是出于“信”才录经的。在“大月氏使伊存”来说

是“口授”,而对“博士弟子景卢”则是笔录,此或谓中国最早“译经”之由来。伊存授经说,时间上可能不够准确,但就这件事本身却极有可能<sup>⑧</sup>。佛教传播从信仰的角度,固以明帝为嚆矢,但中国人对于佛教的了解或早于明帝。

既然如此,那么佛教之于明帝时代,就不是什么新鲜事。皇帝本人既知佛教之梗要,至尊至贵的皇弟楚王,在其封地的宫内还经常举行佛教的宗教仪式,供养了来自外国的“优蒲塞”和“桑门”。按理说,佛教的传播可以借此东风,很快地发展下去。但奇怪的是,自明帝以后,罕见佛教传播的兴旺景象,相反连明帝在位期间那点热闹的气氛都消失了。仿佛是一出闹剧,刚开了头却又煞了尾,一直到桓帝时代才接续前缘。这是怎么回事?

古代的佛教徒似已注意到这个问题。事见《续集古今佛教论衡》引《吴书》:

吴主孙权问尚书令都乡侯阚泽曰:“汉明帝梦神遣中郎蔡愔等向西域寻访佛教,至今可有几年?”阚泽对曰:“从汉永平十年至赤乌四年,合一百七十年。”吴主曰:“佛教入汉已久,何缘今始传至江东?”阚泽对曰:“汉明帝永平十四年,南岳道士褚善信正朝之次,与诸山观道士褚信同上一表,乞与西域法师迦叶摩腾、竺法兰等比较。尔时佛教初到洛阳,汉明帝始立白马寺、兴圣寺。法师迦叶摩腾、竺法兰翻译众经,始从汉读。道士未达正法,深浅不知,上表乞与对验。明帝许之。至正月十五日,在白马寺门,南岳诸道士设坛,将所学法名灵宝经置坛上放火焚之。当时以正法力故,道士书典悉从火化,无有遗者;复作种种技术,施用无效。诸道士等皆大惭耻,南岳褚善信、费叔才等在会中自憾而死,自余道士明帝敕放还岳。其时不予竺法兰说法者,不得出家。尔时无人流布,后遭汉

政凌迟，兵戈不息，是以佛法一百七十年中而不通。

按《吴书》、《隋书·经籍志》著录，仅二十五卷。其下注云：“韦昭撰，本五十五卷，梁有，今残缺。”现诸卷并亡，佚文散见于《三国志》、《后汉书》注中。韦昭，《三国志·吴志》有传，孙亮时为太史令，撰《吴书》。诚如是，则该书乃公元三世纪时史学著作。但此段引文，明显为后世佛、道争辩邪正的伪作，它解释自汉明帝以后“佛法不通”的缘由亦属无稽。然而，此事自此成为中国佛教史上的一段公案，却也是无法回避的了。

历来的佛教史籍，皆把明帝看成是阿育王或迦腻色伽式的人物，而前引感梦求法的传说，既是其动因，又是其结果。如佛教徒所伪造的《汉法本内传》，一作《汉显宗开佛化法本内传》，仅从书名，就知作者是把明帝（显宗）认作护法的帝王。汤用彤先生曾为这些著述者的心理作了一番描述：

至若佛教之流传，自不始于东汉初叶。明帝虽曾奖励此新来之教，然其重要，亦自不如后日所推尊之甚。至若后世，必定以作始之功归之明帝，则亦有说。盖释迦在世，波斯匿王信奉三宝，经卷传为美谈。其后孔雀朝之阿输迦、贵霜朝之迦腻色伽，光大教化，释子推为盛事。东晋弥天释法师亦曾曰：不依国主，则法事不立。汉明为一代名君，当时远人伏化，国内清宁，若谓大法滥觞于兹，大可为僧迦增色也。<sup>⑨</sup>

作为佛教信徒，具有此种心态是可以理解的；但近世治中国佛教史的学者犹重复这种说法，对明帝与佛教的关系持肯定态度。如有的著述认为楚王奉佛一事“得到汉明帝的褒奖”，并由此而推出“汉明帝时派人去西域求法道理上是可能的”，以及“汉明帝求法说从其基本情节来说是可信的”等结论<sup>⑩</sup>。即上引

汤用彤先生文亦称明帝“曾奖励此新来之教”，因而认为明帝感梦的“传说应有相当根据，非向壁虚造”。这就未免失察了。

与此相联系，对于明帝以后百年内佛教颓废这一基本事实的解释，亦似未得要领：

考伊存授经、明帝求法以后，佛教寂然无所闻见。然实则其时仅为方术之一，流行民间，独与异族有接触，及好奇之士乃有称述，其本来面目原未显著。当世人士不过知其为夷狄之法，且视为道术之支流，其细已甚。后世佛徒，尤耻其教之因人成立，虽知之而不愿详记。岂真佛教在桓灵以前未行中国耶？盖亦因其傍道术而其迹不显耳。<sup>⑪</sup>

按佛教“傍道术”，并非仅明帝至桓灵这近百年的现象。桓灵及其以后，延至三国末年，佛教一直同道术纠缠不清，这已为文献和考古材料所证实<sup>⑫</sup>。而恰恰是在这段时期，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并普遍开花。帝京洛阳、徐海地区、江南、巴蜀、西域，甚至塞北边郡，都有早期佛教遗物出土。可见，把明帝以后佛教不行归咎于“因傍道术而其迹未显”，不尽符合佛教传播的事实。

是以这段历史公案到今天尚未真正了结。故而还有必要对永平八年明帝所下退赎诏书的本意及其相关问题，进行检讨。

现将《后汉书·楚王英传》这件诏书的前后文字引述完全，以便分析：

英少时好游侠，交通宾客，晚节更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八年，诏令天下死罪皆入缣赎。英遣郎中令奉黄缣白纨三十匹诣国相曰：“托在蕃辅，过恶累积，欢喜大恩，奉送缣帛，以赎愆罪。”国相以闻。诏报曰：“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何嫌何疑，当有悔吝？其还赎，以助伊蒲塞、桑门之盛饩。”因以班示诸国中傅。英后遂

大交通方土,作金龟玉鹤,刻文字以为符瑞。

十三年,男子燕广告英与渔阳王平、颜忠等造作图书,有逆谋,事下案验。有司奏英招聚奸猾,造作图讖,擅相官秩,置诸侯王公将军二千石,大逆不道,请诛之。帝以亲亲不忍,乃废英,徙丹阳泾县,赐汤沐邑五百户。遣大鸿胪持节护送,使使人奴婢工伎鼓吹悉从,得乘輜辇,持兵拏,行道射猎,极意自娱。男女为侯主者,食邑如故。楚太后勿上玺绶,留住楚宫。

明年,英至丹阳,自杀。立三十三年,国除。诏遣光禄大夫持节吊祠,赠赙如法,加赐列侯印绶,以诸侯礼葬于泾。遣中黄门占护其妻子。悉出楚宫属无辞语者。制诏许太后曰:“国家始闻楚事,幸其不然。既知审实,怀用悼灼,庶欲宥全王身,令保卒天年,而王不念顾太后,竟不自免。此天命也,无可奈何!太后其保养幼弱,勉强饮食。诸许愿王富贵,人情也。已诏有司,出其有谋者,令安田宅。”于是封燕广为折奸侯。楚狱遂至累年,其辞语相连,自京师亲戚诸侯州郡豪桀及考察吏,阿附相陷,坐死徙者以千数。

包括前举二例,大多数关于中国佛教史的著述,皆因诏书内有“何嫌何疑”、“还贼”,以及“助伊蒲塞、桑门之盛饌”等词句,而谓明帝属意佛教,“服膺佛教的教义”<sup>[3]</sup>。有的学者甚至认为,这道诏书是“明帝称许楚王英信仰佛教才下的”,当时楚王英以黄缣、白纨三十匹向朝廷谢罪,“明帝深为这种忠诚之心所感动,认为他如此开明,完全是信仰佛教的结果”<sup>[4]</sup>。这实是一个严重的误会。

自西汉末年以来,讖纬之学开始流行。东汉光武帝刘秀因图讖以成就帝业,即位后尤加崇信,去世前正式“宣布图讖于天下”(《后汉书·光武帝纪》),使之法定化。因而东汉一

朝,特别是它的初期和中期,朝野上下,均被讖纬的神秘空气所笼罩。故《后汉书·张衡传》谓,“自中兴之后,儒者争学图讖,兼复附以妖言”,蔚为一时风尚。楚王英奉佛应是在这种背景条件,或者说在这种大气候下出现的事物。

又,楚王英本传既云“晚节更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则他开始信仰佛教应是在明帝之时,具体说在永平八年之前,亦即明帝在位的前半期。而明帝亦为讖纬所累。《后汉书·张衡传》:“初,光武善讖,及显宗、肃宗因祖述之。”《东观汉记·明帝纪》:“孝明皇帝尤垂意于经学,即位,删定拟议,稽合图讖,封师太常桓荣为关内侯,亲自制作《五行章句》。”这种立场或决定了他在执政初期,对于包括黄老、佛教在内的方技术数,采取比较宽松的政策。另外,楚王英与明帝之间私人关系较好。本传称:“自显宗为太子时,英常独归附太子,太子特亲爱之。及即位,数受赏赐。永平元年特封英舅子许昌为龙舒侯。”刘英恃宠,祭奉不入祀典的外国之神,并在楚王宫内私自接纳优蒲塞、桑门这类外国佛教徒,明帝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未便直接干预。故永平八年诏书出现那种表面看来好像“称许”的语言,并以退赎的方式,使后世误以为明帝“奖励”楚王英之所为。

以上,可以看做是事物的一个方面

但是,迷信讖纬的人往往最忌讳讖纬,这又是事物的另一个方面。明帝的父亲光武帝刘秀靠图讖起家。《后汉书·光武帝纪》载:“莽末,天下连岁灾蝗,寇盗蜂起。地皇三年,南阳荒饥,诸家宾客多为小盗。光武避吏新野,因卖谷于宛。宛人李通等以图讖说光武云:‘刘氏复起,李氏为辅。’光武初不敢当,然独念兄伯升素结轻客,必举大事,且王莽败亡已兆,天下方乱,遂与定谋,于是乃兵拏。十月,与李通从弟轺等起于宛,时年二十八。”更

始三年,刘秀霸业已成,颍川人强华又从关中来献《赤伏符》,以“四七之际火为主”的谶语<sup>①</sup>,谓刘秀当为天子。同年六月,刘秀乃祭告天地,即皇帝位,改更始三年为建武元年。这段历史,明帝是深知的。无论哪一位皇帝,皆以为自己“受命于天”,光武既应谶记,明帝亦以谶记为生命。但这种东西只能用于帝王本身,倘若别人也用图谶妄称天命,无疑对其统治构成极大威胁;也就是说,他是绝不允许别人以谶记图谋不轨的。明帝尽管对楚王英宠渥有加,但一旦楚王以图谶谋反,危及他的地位,就不再客气了。

明帝其人,精明而忌刻。袁宏《后汉纪·明帝纪》云:“上性急,好以小察为明,公卿大臣数被诬毁,尚书近臣尤甚。由是朝廷悚栗,事为多苟且,以避诛责。”《后汉书·钟离意传》亦谓“帝性褊察,好以耳目隐发为明”。这就是说,他对中央和地方(郡国)的风俗事物是很留意的,而且以耳目监视政令的实施。他不止一次地诏令百官要据实报告,不要有什么阴蔽,“其言事者,靡有所讳”(《后汉书·明帝纪》)。臣下深知明帝脾气秉性,不敢在自己所司职务内循私,“皆上封事”(同上),使下情及时上达。特别对以图谶逆谋的大事,主管官员,即或身居高位,若知情而不举,必加严惩。如司徒虞延,在楚王英事发之前,有人“私以楚谋告延,延以英藩戚至亲,不然其言”,并不奏闻。“及楚事发觉,诏书切让,延遂自杀。”(《后汉书·虞延传》)继虞延任司徒的邢穆,其自杀亦似预知淮阳王延“逆谋”的缘故<sup>②</sup>。永平冬十月出现日食,明帝以制书的形式明令臣下勉思其职,并指出“有司陈事,多有隐讳,使君上雍蔽,下有不畅”(《后汉书·明帝纪》)。制下后仅隔一个月,楚王英即被燕广告发谋反,而事后燕广亦以告发有功被封为折奸侯。或燕广之举报与明帝此次颁制有关。

从永平八年诏书的语意来看,事前似已

有人向明帝报告楚王英信佛之事,受到一定程度的猜忌;而楚王英也探听到了某些消息,因而趁朝廷下诏可以以缣赎罪的时候,派遣郎中令,拿着三十匹黄缣、白纨来见中央派到楚国监督并管理封国事务的“国相”,托他向明帝代陈衷曲,希望得到朝廷的谅解。由于笔者前面所分析的原因,明帝未对楚王英责难。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对刘英奉佛一事的首肯,更无论“称许”、“奖励”。楚王之所以奉缣赎罪,系专为祀黄老、浮屠,重点在祀浮屠;而明帝下诏亦专对楚王祀黄老、浮屠,重点亦在祀浮屠。此系了然之事。虽然诏书中有“何嫌何疑”之语,但从道理上讲,唯其事受到嫌疑,楚王托国相辩诉嫌疑,才会引出这句话来。换言之,这句话是有针对性的,绝非无的放矢。至于明帝将此诏班示诸国中傅,不过做个姿态,以示自己的宽容大度。楚王没有头脑,误以为明帝在支持他,因而下诏之后不仅不吸取教训,反而有恃无恐,继续与方士来往,“作金龟玉鹤,刻文字以为符瑞”,致招杀身之祸。

范晔记载这段史实时,先述诏书的由来,次录诏书的内容,再写楚王在下诏后的举动及其遭遇,因果关系明确,字里行间已隐含说明楚王英获罪与其浮屠之教的信仰有关。按佛教初传中国之时,它的深奥教义并不被中国人所理解,中国的早期奉佛者也不想了解这种东西,而仅仅把它当作祈祥禳灾的方术的一种,与当时社会上流行的其他方术并无区别。佛教既被认作“方术”,那么佛教徒自然就是“方士”<sup>③</sup>。楚王英以“交通方士”向朝廷赎罪,又因下达的诏书对此有所谅解而滋长了骄慢之心,从而更大规模地“交通方士”,联系诏书的具体内容,这些前后被交通的方士必然包括优蒲塞、桑门等外来的佛教徒在内。至于这些佛教徒身份的方士,是否参与了楚王英的谋反活动,范书没有说,但从其行文的内在逻辑,不能排除这种可能<sup>④</sup>。“刻文字以

为符瑞”和“造作图讖”都是使用隐语,以预言的形式昭示天意。我们虽不掌握明帝朝佛教徒以预言家的身份占验吉凶福祸的直接材料,但桓、灵时代确有以此面目出现的译经僧。如桓帝建和二年(148)来洛阳的安息僧人安世高,对于“七曜五行之象、风角云物之占”<sup>⑨</sup>这种本来是中国的方术,就极为熟悉,而桓帝时代的佛教尚停留在楚王宫中浮屠与黄老并祠的阶段,并无任何进展,我们完全可以用安世高的例子来推知明帝时外来佛教徒的形象,以及他们在当时流行的讖纬迷信活动中所扮演的角色。

楚王英造作图讖,应该有一个渐进的过程,它是从“刻文字为符瑞”逐步发展来的;完成用以谋反的图讖,也并非一人之力,而是各类方士的集思广益。楚事发觉后,有司案验的罪名是“招聚奸猾,造作图讖”。所谓“奸猾”之徒,恐主要是指没有社会地位和身份的方士以及下层的游民。楚王英的两个谋主王平与颜忠,王平系东汉开国功臣王梁之后,可以算作豪门的代表;而颜忠,身份不详,《后汉书·耿纯传》谓其为“楚人”<sup>⑩</sup>,他不仅在楚地惑乱刘英,还到济南安王刘康的封地“谋议不轨”,其方式仍是“案图讖”(《后汉书·济南王康传》),可见他颇善讖纬之学,或是楚王英封地的一个方士,或是一个方士化的儒生。他是楚王英宫中包括优蒲塞、桑门在内的各类方士所献符瑞和讖言的集大成者,楚王英因之获罪的图讖,应是由他汇总而成立的。

刘英以图讖谋反,给予明帝的打击实在是太重了。虽说明帝以“亲亲不忍”,表面上未对楚王采取严厉措施,但他仍于流放的次年自杀,说明“不忍”并非事实。在被放逐的几个月中,他一定看到了明帝对此事的明确的立场,感到了绝望。楚王英死后,“楚狱遂至累年,其辞语相连,自京师亲戚诸侯郡都豪桀及考案吏,阿附相陷,坐死徙者以千数”,而其中

首先要惩办的就是参与“造作图讖”的人。《后汉书·薛汉传》:“汉少传父业,尤善灾异讖纬,教授常数万人。建武初,为博士,受诏校定图讖……永平中,为千乘太守,政有异迹。后坐楚事辞相连,下狱死。”薛汉被诛后,无人敢于收尸。他的门生廉范“独往收殓之,吏以闻,显宗大怒,召范入,诘责曰:‘薛汉与楚王同谋,交乱天下,范,公府掾,不与朝廷同心,而反收殓罪人,何也?’范叩头曰:‘臣无状愚憨,以为汉等皆已伏诛,不胜师资之情,罪当万坐。’”后以廉范为名将廉颇之后,才予赦免。犯人伏法,门人收尸,人情之常,明帝尚不能容,其对造讖之徒的怨恨于此可见一斑。

楚狱为东汉有名的大案,其镇压之剧为东汉前期仅见。《后汉书·袁安传》:

永平十三年,楚王英谋为逆,事下郡核考。明年,三府举(袁)安能理剧,拜楚郡太守。是时英辞所连及系者数千人,显宗怒甚,吏案之急,迫痛自诬,死者甚众。安到郡,不入府,先往案狱,理其无明验者,条上出之。阿丞掾吏皆叩头争,以为阿附反虏,法与同罪,不可。安曰:“如有不合,太守自当坐之,不以相及也。”遂分别具奏。帝感悟,即报许,得出者四百余家。

《后汉书·寒朗传》:

永平中,(寒朗)以谒者守侍御史,与三府掾属共考案楚狱颜忠、王平等,辞连及隧乡侯耿建、朗陵侯臧信、护泽侯邓鲤、曲成侯刘建。建等辞未尝与忠、平相见。是时显宗怒甚,吏皆惶恐,诸所连及,率一切入,无敢以情恕者。朗心伤其冤,试以建等物色独问忠、平,而二人错愕不能对。朗知其诈,乃上言建等无奸,专为忠、平所诬,疑天下无辜类多如此。

但寒朗未能及时将刘建等的冤情上奏,又遭明帝怒责。朗陈述了原因,其中有一段话很值

得我们深思：

臣见考囚在事者，咸共言妖恶大故，臣于所宜同疾，今出之不如入之，可无后责。是以考一连十，考十连百。又公卿朝会，陛下问以得失，皆长跪言，旧制大罪祸及九族，陛下大恩，截止于身，天下幸甚。及其归舍，口虽不言，而仰屋窃叹，莫不知其名冤，无敢忤陛下者。

明帝盛怒之下，人人心怀自危，掌管刑律的人为避嫌和责罚，往往宁左勿右，明知其冤而不敢言，遂成冤狱。

这个案件牵连的人数高达数千。《楚王英传》所谓“阿附相陷，坐死徙者以千数”是某些主审官吏查实上奏，并释放确实被冤的人员之后，所统计的数字。比如上引袁安和寒朗二传，即在事后分别理出“四百余家”和“千余人”。但终明帝之世，楚狱尚未结案。汉章帝建初元年（76），司徒鲍昱奏称：“臣前为汝南太守，典治楚事，但汝南一郡，系者千余人，恐未能尽当其罪。先帝定，大狱一起，冤者过半，又诸徙家，骨肉离散，孤魂不祀，骸骨流离，死生被毒，一人呼嗟，王道为亏。宜一切还诸徙家，使生者悦，死者得归，兴灭继绝，和气可致。”章帝采纳了这个建议，“即诏坐楚、淮阳事徙者，令归本郡”（袁宏《后汉纪·章帝纪》）。至此，楚狱方才告一段落。

不难想象，楚王英案牵动了整个东汉朝廷，历时达数年，被罪人数如此之多，而处罚又如此之重，一时确有白色恐怖之感。如果佛教徒参与楚王英以图讖谋反一事成立，那么对佛教的打击无疑是巨大的。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章帝以后，侥幸得免的佛教徒不敢公开活动，佛事遂寝。退一步看，即使当日佛教徒未曾参与楚案，但树倒猢狲散，这些豢养在楚王宫中的优蒲塞、桑门已成惊弓之鸟，楚王英的悲剧从开场到结束，他们都是亲眼目睹的，即以楚事为戒，亦不敢再祀浮屠，以招致不必

要的嫌疑。此理之当然。

这种情况大概持续了二三十年，到和帝永元中，亦即公元一世纪末、二世纪初，见于张衡的《西京赋》才重又提到了佛教，但那时似已转入民间（或佛教重新进入中原）以街头卖艺的方式出现，一般人根本想不到在这种杂伎表演中包含有佛教内容<sup>②1</sup>。到二世纪中期，这种杂伎又被宫廷的乐师所吸收，用在宫廷元旦的庆典上，但佛教内容仍不明朗<sup>②2</sup>。此后，由于桓帝的崇奉，佛教才抬起头来。而自永平十三年以来，佛教不行，实与明帝对楚王英一案的处理有关。所以，范晔在《后汉书·西域传》里说：

世传明帝梦见金人长大，顶有光明，以问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名佛，其形长丈六尺而黄金色。”帝于是遣使天竺问佛道法，遂于中国图画形象焉。楚王英始信其术，中国因此颇有奉其道者；后桓帝好神，数祀浮图、老子，百姓稍有奉者，后遂转盛。

他用了“世传”两个字表示了对明帝感梦说以及明帝是否奉佛的怀疑。“楚王英始信其术，中国因此颇有奉其道者”，既肯定了佛教在中国初传的事实，又含蓄指明最初开始信奉佛教的是楚王英，而非明帝。但是，因楚王英的信仰，中国才有“奉其道者”，这个“奉其道者”是谁，范晔没有说，或为永平八年以后加入楚王宫中优蒲塞、桑门祭祀浮屠行列的方士们。“后桓帝好神，数祀浮图、老子，百姓稍有奉者”，这个“后”字，上距楚王英时代将近百年，然而从语意看，“颇有”与“稍有”相比较，似乎此时信奉佛教的程度还不如彼时。为什么？范晔也没有讲，以其著史的谨严态度，他必有所本。最后他用“后遂转盛”这句话概括了此时佛教已进入中国的现实。

综上，现在可以对这段历史公案作一个总结。明帝时代，佛教确已进入中国，它的标

志是楚王宫中的浮屠祭祀,以及优蒲塞、桑门等外来佛教徒的出现。也可能由于楚王英的信仰,汉明帝间接对佛教有一定了解,这应该来自于他对包括楚国在内的郡国风俗事物的关注和察访。感梦求法说是虚构的。永平八年的退赎诏有很强的针对性,不能认为这是明帝奖励佛教的凭据,更不能以此谓明帝对佛教有好感,甚至崇信佛教。最初,他可能因为当时弥漫朝野的谶纬迷信,也可能因为在即位前与楚王英建立起来的亲密关系,对佛教的传播,在一定范围内采取了比较宽容的做法。但这显然是有限度的。当这种传播危及他的统治时,他就毫不客气地予以镇压,绝不手软,这应是明帝以后佛教的传播几乎处于停顿的根本原因。

① 参见马司帛洛《汉明帝感梦遣使求法事考证》,载冯承钧《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第四编,商务印书馆,1962年,17—19页;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华书局,1983年,上册,11页。

② 镰田茂雄《中国佛教史》,东京出版会,1982年,第一卷《初仏期の仏教》,111、116页。

③ 吕澂《中国佛教源流略讲》,中华书局,1979年,20页。

④ 周一良《牟子理惑论时代考证》附录二《胡适先生讨论函》,《燕京学报》第三十六期,1949年。

⑤ 汤用彤上引书,上册,36页。

⑥ 大月氏翕侯丘就却于公元一世纪上半叶建立贵霜帝国之前,大月氏统治的中心地区尚在阿姆河流域。近年考古工作者在阿富汗接近前苏联边境的西伯尔罕(Siberkand)发掘了一处墓葬,时间大约在公元前一世纪至公元后一世纪这二百年之内。据发掘者沙里阿尼迪(V. I. Sarianidi)博士称,这可能是贵霜王室的墓葬。内中出土了近二万件金饰品,有许多古典题材的神像,也有贵霜王像。这些像的眉间有类似佛像眉间白毫的标记,但没有任何佛像出土,也没有一件纯粹的佛教艺术品,很难说此时此地已流行佛教。学术界一般认为大月氏亦即贵霜流行佛教是在公元二世纪中期的迦腻色伽时代。既然如此,那么不可能在时间上还很早的公元前2年,会有大

月氏的使者授经,因而对于这个大月氏使者伊存的出处,我是有怀疑的。

⑦ 吴焯《从考古遗存看佛教传入西域的时间》,《敦煌学辑刊》第八辑,1985年。

⑧ 吴焯《关中早期佛教传播史料钩稽》,《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4期。

⑨ 汤用彤上引书,上册,20页。

⑩ 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一卷,96—97页。

⑪ 汤用彤上引书,上册,41页。

⑫ 参见俞伟超《东汉佛教图像考》,《向达先生纪念论文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吴焯《四川早期佛教遗物及其年代与传播途径的考察》,《文物》1992年第11期。

⑬ 中村元主编《中国佛教发展史》,金万居译,天华出版公司,1984年,第一卷,26页。

⑭ 镰田茂雄上引书,第一卷,128—129页。

⑮ 《后汉书·光武帝纪》李贤注:“四七,二十八也。自高祖至光武帝初起,合二百八十年,即‘四七之际’也;汉火德,故‘火为主’也。”

⑯ 《后汉书·天文志》:“(永平)十六年……司徒邢穆,坐与阜陵王延交通逆谋自杀。”

⑰ 汤用彤上引书,上册,37—38页:“按佛教在汉代纯为一种祭祀。其特殊学说为鬼神报应。王充所谓‘不著篇籍,世间淫祀,非鬼之祭’,佛教或其一也。祭祀既为方术,则佛徒与方士最初当常并行也。”

⑱ 《资治通鉴·汉纪三十七》:“谓‘楚王与方士作金龟玉鹤,刻文字为符瑞’,则已指明方士确曾参与了楚王英造作图谶的一系列活动。

⑲ 《出三藏记集》卷十三《安清传》。

⑳ 《后汉书·济南王康传》有“渔阳颜忠”之语,疑因循《楚王英传》“渔阳王平、颜忠”文字,实出于笔误。当以《耿纯传》楚人说为是。

㉑ 张衡《西京赋》曾提到“桑门”,并在描述长安市上的杂技表演时,出现了“白象行孕”、“舍利”等与佛教有关的名词和典故。参见拙文《关中早期佛教传播史料钩稽》。

㉒ 二世纪中期,蔡质《汉仪》记述皇帝在元旦接受朝贺后,与群臣一起观看演出。其中有一个节目叫《舍利兽从西方来》,又有《巨象行乳》之乐。参见拙文《关中早期佛教传播史料钩稽》。